

关长交流与企业出口¹

——基于关长流出地视角

王永进² 燕晓娟³

摘 要 官员交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治理制度,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提升官员治理水平上卓有成就,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基于2007—2013年间关长交流的自然实验,利用倍差法考察关长交流对关长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长交流会显著促进关长流出地的企业出口,并且这种影响只在关长流入地是出口较多的地区时发挥作用;这种影响也会因企业出口形式、关长能力和任期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关长交流的作用会在关长交流当期就发挥作用,但随着关长交流年份的延长,这种作用逐年下降,并在关长交流后的第三年消失;关长交流的作用仅通过影响流出地出口企业目的国范围来影响企业出口数量。

关键词 关长交流;企业出口;关长流出地

0 引言

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底蕴孕育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官员干部管理制度。在中国,地方官员的任命由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决定,地区间的人员交流在公共部门间较为常见(Jiang and Mei, 2020),但各级官员不得在不同部门和地区间随意流动,需由上级部门出于工作目标决定(Hassan, 2017)。地方官员的来源方式可以划分为本地内部晋升和官员异地交流,后者又包括地区之间的官员交流、上下级党政机关官员交流等(陈绍俭等, 2019)。异地交流而来的官员拥有在其他地区从事经济和社会事务的经历,给流入地带来了新鲜的经验和资源,相较于本地官员,交流官员对地区经济增长拥有更强的促进效应(张军和高远, 2007)。

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竞争中性原则与中国对外贸易利益:理论机制、实证检验与量化分析(项目编号:72073073)”。

² 王永进,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E-mail: wyjin17@163.com。

³ 燕晓娟,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E-mail: yanxiaojuan516@163.com。

这一逻辑已经被大量的经济文献验证(杨海生等,2010;董志强等,2012)。但是,官员交流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依然存在以下问题:第一,鲜少有文献从官员交流的角度考察官员流出地的经济发展,而实际上官员对其来源地存在地区偏爱现象。Hodler and Raschky(2014)通过研究发现国家领导人在任期间其家乡的夜间灯光亮度显著增强的现象,并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地区偏爱(regional favoritism)。基于地区领导层面的研究,依然发现官员对其来源地存在地区偏爱现象(徐现祥和李书娟,2019)。第二,官员交流与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也忽略了对国际贸易的考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相比开放前增长逾200倍,2009年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贸易国,此后10年间出口年平均增长率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更是在2019年在全球经济放缓的背景下实现对外贸易逆势增长,成为当年货物出口额最多的国家。中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经济,其经济增长极易受到出口贸易的影响。出口作为衡量地方经济增长的“三辆马车”之一,能够彰显地方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天然的”更易受到政府官员青睐的属性(黄顺武等,2017)。现有研究显然缺乏从官员交流视角出发对出口贸易的深入探讨。

本文以中国各直属海关关长为研究对象,考察关长交流对关长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之所以选择以海关关长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基于官员交流和官员地区偏爱的研究多是从中央官员和省市级领导人的角度出发,很少有文献关注专业性官员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且,各直属海关关长作为各个海关行政事务的主要负责人,掌握国内外最新国际贸易政策和信息,其职位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致使海关关长与企业出口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具体而言,本文利用中国独特的干部管理制度,匹配2007—2013年间中国直属海关关长与企业出口数据,采用倍差法实证考察关长交流如何影响关长流出地企业出口。本文发现,关长交流显著影响了其流出地的企业出口数量;这种影响在关长交流期间并不会一直持续,在关长交流三年内会逐渐消失。关长主要通过调任到出口更多的地区对流出地企业出口产生影响;关长交流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影响有着不可忽视的异质性,并且关长交流的作用会受到关长能力和任期的影响。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关长交流的影响渠道,发现关长交流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出口目的国数量来影响企业出口。在控制了新上任关长的效应后,文章的结果依然显著。

本文的工作与黄顺武等(2017)、王永进和黄青(2018)以及Jiang and Mei(2020)的工作相近。黄顺武等(2017)通过分析1999—2009年间多地市长和市委书记数据发现,市长和市委书记变动会影响辖区企业出口,且两者作用存在显著差异。王永进和黄青(2018)的工作主要是利用2003—2012年间海关数据,考察法官交流对流入地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Jiang and Mei(2020)考察了

1999—2016年间的中国省级领导轮换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发现当一个省领导被任命为新省党委书记时,新省到旧省的贸易量增加,反之则不然。本文与 Jiang and Mei (2020) 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本文关注的是海关关长的交流,而不是省市级官员的行动。关长的数据较少,但关长职位相较于省市级官员的特殊性和职位的专业性以及关长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使他们可能拥有更多的权力和能力影响企业出口;二是虽然 Jiang and Mei (2020) 的工作也关注了省长来源地,但仅考察了区域之间的贸易往来。本文则考察了官员交流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拓展了官员交流的研究边界。此外,现有官员交流与经济绩效的研究仅关注官员交流作用存在与否的问题。仅王永进和黄青(2018)的研究中考察法官交流对法官流入地企业出口作用的动态效应问题。本文基于关长交流与企业出口的分析表明,关长交流对其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不是“是否”的问题,而是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1 文献综述与机制分析

1.1 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

中国的官员交流现象日趋常态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受到经济学家的广泛和持续研究。中国官员交流的研究开始于本世纪初,主要关注官员交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周黎安(2004)是国内较早开始研究地方官员问题的学者,他在研究中并未涉及官员交流的内容,但是提出了著名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各地方官员会为了增长而竞争,在政治高度集权和经济制度高度分权的情况下,官员的晋升可以看作一场“锦标赛”(Li and Zhou, 2005)。徐现祥等(2007)以省长和省委书记为研究对象,考察这两类省级官员的异地交流对流入地经济增长的影响,首次明确了官员交流的经济学含义。地区之间官员交流被称为的横向交流外,中央官员调任地方任职的情况则被称为央地交流或者纵向交流。张军和高远(2007)将官员交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无论是跨地区的官员交流,还是央地交流,交流而来的官员均拥有比本地升职官员更高的经济增长效应。整体而言,官员交流会促进地区经济增长(杨海生等, 2010; 董志强等, 2012)。此外,官员交流亦会影响外商投资以及城市绿色增长。例如,由于外来官员相对独立,一般不会与当地各方利益集团相勾结,拥有更加开明的政治态度,能够向外界社会传递更加开放的经济环境,对于吸引外商投资有积极作用(吕朝凤和陈霄, 2015; 王贤彬和徐现祥, 2017)。此外,地方官员在其任期内在晋升激励的作用下,倾向于与地方企业达成“合作”(杨瑞龙等, 2013)。具体而言,地方官员在其任期内通过放松企业排污管制措施,允许地方企业超额排污

以此促进企业利润增长,地方政府则可以在任期内获得短期GDP增长,提高其晋升概率。而官员异地交流则可以打破当地政府的腐败行为(陈刚和李树,2012),限制地方官员在同一地区的任职期限,这将有助于打破官员与企业的合谋行为,从而有助于降低地区环境污染(梁平汉和高楠,2014),促进地区绿色增长(刘玉海和赵鹏,2018)。

已有文献在研究官员交流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的基础上,还分析了官员交流模式和形式的异质性。官员交流大致可以划分为跨地区交流和央地交流。总体而,跨地区官员交流对流入地经济增长有促进效应,但当上任官员来自中央调任,则地方经济并不具备优势甚至会受到拖累(王贤彬和黄亮雄,2020)。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曾在其研究中之指出,央地交流主要是以“培养”为主,而培养成本则是相较于其他地区较慢的经济增长。因此,央地交流极有可能造成地区经济增长放慢,甚至成为地区发展的阻碍。但一般央地交流的官员在一个任期结束后,官员政绩得到显著提升。官员交流也会存在区域异质性。徐现祥等(2007)按照官员交流的来源地将官员交流的样本划分为沿海内陆交流、沿海内部交流和内陆内部交流,其中沿海内陆交流对经济增长的效应最为显著,沿海内部交流次之,内部之间交流的效应最弱。张军和高远(2007)的研究则将样本按照东部和西部划分,官员交流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东部要明显高于西部。但基于外商投资视角的官员交流的研究却得出与上述文献相差较大的结论,体现了官员与辖区匹配模式的地区差异。王贤彬和徐现祥(2017)通过研究发现对于内地而言,来自其他省区的官员交流和来自中央的官员交流对外商投资都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在沿海样本中,无论是来自其他省区的官员交流还是来自中央的官员交流对外商投资都有显著负向影响。

1.2 官员与企业出口

官员更替是政府官员研究深入企业微观层面的重要视角。早期官员更替的研究主要是从政治稳定性的角度探讨:Alesina et al. (1996)强调政治不稳定性来自于政府最高权力的变更,政府不稳定性则通过遏制投资影响经济增长,关注的仍然是组织视角。后续研究则更强调对官员更替经济效应的直接考察(Fisman,2001;Jones and Olken,2005)。Jones and Olken(2005)是最早考察官员更替经济效果的学者,他们基于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考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该研究强调政治精英对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该研究是政治领导人更替经济效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Julio and Yook(2012)的研究是官员更替影响微观企业的代表性文献之一,该研究证实,国家领导人的更替轻则提高政治不确定性,重则导致政局动荡,企业经营及战略决策会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性受到冲击。在投资层面上,企业

会倾向于延迟其投资,直至政治不确定性消失为止。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诸多学者考察政治不确定性微观经济后果的重点研究对象。美国以州作为其行政区划单位,各个州的州长选举是研究政治不确定性经济效应时衡量各州政治不确定性的重要指标,研究视角涉及企业投资(Jens,2017)、IPO(Çolak et al.,2017)及政府债券发行(Gao et al.,2019)等,研究一致认为选举所导致的政治不确定性会使企业经营更加谨慎。基于中国视角的讨论基本借鉴上述研究,从企业政治关联与政治不确定性相结合的视角出发,考察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信贷(Cao et al.,2019)、研发周期(Luo and Zhang,2022)、企业排污(Deng et al.,2019)和公司绩效(Earle and Gehlbach,2015;Zhong et al.,2019)的影响,特别是省市级官员更替的经济效应。

上述研究虽较为详细地研究了官员更替对微观企业的经济效应,但并未涉及官员更替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企业出口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基于“新新国际贸易理论”的观点;第二类可以划分为制度因素。Krugman(1980)提出的“母市场效应”理论认为,只有在母国已经获得竞争优势的产品才具备出口的可能性。Melitz(2003)则扩展了Krugman的思想,他认为企业做出是否进行出口贸易的选择时表现出“自选择效应”,只有生产率最高的企业才会出口。基于企业微观因素的“新新国际贸易理论”(Baldwin,2005)认为,某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竞争优势,是由于其在国内市场获得了诸如规模经济、技术创新等竞争优势。但基于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的研究却发现这类国家的出口企业并不具备规模或者自主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禀赋常常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出口企业的竞争优势来源,但仅根据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并不能全面解释发展中国家异质性企业的出口行为差异。后续学者逐渐发现制度因素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Levchenko(2007)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基于不完全契约与制度因素的互动关系出发,考察制度因素与出口之间的关系:母国制度质量越高,该国契约密集型产业出口越多;对于母国制度质量有待提高的国家而言,非契约密集型产业反而会因所受制度约束较小而在出口中获得比较优势。除宏观层面制度因素,企业内部制度改革也是影响微观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戴美虹等,2021)。少数有关地方官员与企业出口之间关系的研究也主要是从官员特征或者地方官员腐败的角度进行探讨。对于中国的贸易奇迹,学者们认为比较优势(林毅夫等,1999)、制度扭曲(张杰等,2008)、财政政策(盛丹和王永进,2010)等因素是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些因素发挥作用离不开地方官员的协调与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中国采取政治上集权、经济上分权的政治治理模式,这使得政府在社会分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与政府建立政治关联成为地方企业获取政策支持和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Boubakri et al.,2008)。黄顺武等

(2017)基于中国市长(市委书记)的研究表明,地方官员的个人特征对企业出口有显著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体现出“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特征。但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密切联系某种程度上又会造成地区腐败,腐败会增加国内市场的进入壁垒(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因而在腐败较为严重的企业,企业会更愿意参加国际市场竞争(刘斌和王杰,2016)。此外,由于贸易中间商更有利于创造公平的国际竞争环境(Olney,2016),因此腐败会增加企业间接出口的可能性。

1.3 机制分析

综上所述,当前有关官员交流的文献主要考察官员交流在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未涉及微观层面的分析;官员更替对微观企业的影响研究也多是从小投资、信贷等角度出发,显然忽视了对企业出口贸易的影响。虽然现有研究已经证实地方官员特征和腐败会影响企业出口,地方官员也倾向于帮扶企业出口,但忽视了官员交流的政策效应以及官员自身存在的地区偏爱现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

企业进行国际贸易的过程是其利用自身和外部资源不断嵌入到国际网络的动态过程(Vahlne and Johanson,2017)。但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的相关制度并不完善(Song,2014),某种程度上使得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又衍生出各种错综复杂的非正式制度,这些非正式制度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成为中国经济革命核心,也成为企业获取商业资源、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途径。依据资源依赖理论,在制度环境不完善的国家,政府掌握更多的资源,企业通过与地方政府官员建立政治联系可以打破正式制度的限制,获得相应的资源,甚至获得对有限资源的独家使用权,进而提升企业绩效(李江涛等,2015)。由于政治联系的回报丰厚,各地方官员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提升在任期间的政治绩效也会积极与企业建立政治联系(范子英和李欣,2014)。海关关长作为个海关行政事务的负责人,掌握国内外最新国际贸易政策和信息。出口企业通过与关长建立合法且健康的政治关联可以以低成本和低风险获取贸易信息和资源,降低企业出口风险,对企业出口可能会产生积极作用。关长也可以在此过程中获得有利于提升政治绩效的回报。例如,扶贫开发是评价海关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的重要指标,企业作为回报通过捐赠帮助海关扶贫开发工作的创建和落实,对关长政治绩效的提升有显著促进作用。

早期研究就曾明确指出中国的文化特征是典型的关系本位(梁漱溟,1949)。中国的这种文化特征致使官员即使在离任后依然会对其来源地存在地区偏爱现象(张平等,2012)。Hodler and Raschky(2014)认为国家领导人可能出于多种原因偏爱他们的出生地,并将这种现象定义为地区偏爱。基于地区官

员的研究进一步将官员地区偏爱的范围扩大,除出生地外,官员对其籍贯地和工作地也存在地区偏爱现象(范子英和李欣,2014;李书娟和徐现祥,2016;范子英等,2016;徐现祥和李书娟,2019)。范子英和李欣(2014)通过研究表明部长对其来源地(出生地、籍贯地和第一工作地)存在偏爱现象,这种偏爱会显著影响其来源地的专项转移支付。因此,官员调任后依然会对其来源地有感情,出于情感需求会主动照顾来源地企业,其来源地企业依旧可以利用之前与官员之间建立的人脉和社会资源(吴文锋等,2009)。

官员对其来源地产生地区偏爱的现象来源于官员的身份认同。身份认同理论认为,不同的身份会将人归类于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同的社会归类又有其不同的社会规范和约束,不同的社会规范和约束又会影响人的行为,由此身份认同影响人的行为。对于参与异地交流的关长而言,从地域上看,关长是任职地的“新关长”,是流出地的“老关长”。异地交流而来的关长,其职业背景构成了其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维度,该关长对其流出地怀有天然感情,形成对流出地的偏爱,自然产生回报流出地的动机。因此,从身份认同的角度出发,对于异地交流关长而言,“老关长”身份使其受到相应社会归类的规范与约束,从而影响关长的决策和行为。其次,身份认同也使“老关长”成为流出地企业的一种社会资源。关长作为主管一方海关贸易事务的官员,掌握大量贸易资源和信息。关长一般交流到贸易更加发达的海关,会掌握更加优质的贸易资源和信息。诚然,流出地并不属于关长新任期的辖区,促进流出地企业贸易发展并不能对关长个人绩效产生直接影响。但曾经的任职经历让关长与流出地出口企业建立密切联系,这类政治联系并不会因为关长的调任而立即消失。企业为自身发展需求自然不会放弃优质社会资源,即使关长离任,企业也会主动与“老关长”保持联系,力图获得最新国际贸易信息。关长出于自身的身份认同感会愿意为流出地企业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甚至为流出地企业指明发展道路。因此,某海关关长在调任其他海关之后,原海关企业与该关长的联系会依然存在,原海关企业依旧可以通过该关长获取国际贸易资源和信息,从而降低企业出口风险、出口成本等,进而促进企业出口。

2 研究背景与识别策略

2.1 研究背景与样本

官员交流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时期(Zhao,2015)。汉唐时代中国就有官员异地任职的制度规定,唐朝所制定的官员任职《回避条例》就规定官吏不允许任本郡州县或邻本郡县的官,宋清时期的回避制度更加

严格。官员交流作为封建官僚制度的产物,在封建时期,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更多是为了制约官员的腐败行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党中央非常重视党政领导干部管理制度的建设,1962—2006年间就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先后做出“两个决定”和“两个规定”^①。2006年8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这意味着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正式制度化。在中国现行官员管理体制下,官员的职位变动取决于官员的“德、能、勤、绩、廉”(李书娟等,2016),官员在任期间的政绩表现是影响其是否具有升职可能的主要因素(Li and Zhou, 2005; 杨其静和郑楠, 2013; 姚洋和张牧扬, 2013)。官员交流在制定初期更多是出于政治考虑,经济考虑通常是次要的。根据《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官员交流主要有三个功能:(1)完成目的地的某些政策任务;(2)磨炼被选官员的领导技能;(3)防止某一地区官员长时间担任领导职务。

在实践中,中国海关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组织机构上分为三层,本文重点研究第二层次中42个直属海关之间的关长交流。直属海关领导一般由一名政治领导人(一般党组书记由关长兼任)构成,关长就本关区内的海关事务独立行使职权,并向海关总署负责。直属海关领导会定期在不同地区交流轮换。海关关长一级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适当职位的可获得性的影响。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获得性又取决于一系列个人无法控制的复杂因素,比如退休、任期限制、纪律调查,或者只是其他职位的变动。通过考察关长在任期间的政治绩效一般可以预测地方的领导人将被提拔或轮换到其他地区,但没有任何可观察的指标可以预测关长交流的目的地,也就是说关长交流的目的地是随机不可预测的。

因此,本文根据海关关长简历中的人生履历确定其是否在一个任期结束后调任其他海关继续担任关长,各海关关长的交流信息从各直属海关官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官网和百度百科等渠道搜集得到。与许多民主政体、其他共产主义政体和非自由民主政体相比,中国区域间官员转移的频率要高得多(Rochlitz et al., 2015)。在2007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直属海关关长的干部中,几乎所有人都在一个以上直属海关工作过。在2007—2013年间,全国共有14个直属海关发生过关长任期结束后调任其他直属海关继续担任关长的情况,占全国直属海关总数的33.3%。七年间中国共70位在任关长,其中共14位关长发生过交流^②。一般来说,较发达和政治意义重大的地区更有可能成为官员交

① 1962年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1990年中共中央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党和国家机关领导干部交流制度的决定》;199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2006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布《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

② 南昌海关发生过两次关长交流:2009年李多宽调任南京海关关长;2012年薛金楼调任乌鲁木齐海关关长。李国2008年从沈阳海关调任福州海关关长,2012年调任乌鲁木齐海关关长。

流的目的地。本文数据也表明,发生过关长交流的海关,“老”关长大都调任到出口更多的海关^①。表1显示了2007—2013年间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情况。

表1 发生关长异地交流的海关

流出地	流入地	流出地	流入地	流出地	流入地
天津海关	上海海关	福州海关	黄埔海关	贵阳海关	昆明海关
青岛海关	深圳海关	汕头海关	青岛海关	南昌海关	南京/乌鲁木齐海关
深圳海关	广州海关	南京海关	青岛海关	满洲里海关	宁波海关
太原海关	沈阳海关	昆明海关	武汉海关	哈尔滨海关	杭州海关
沈阳海关	福州海关	黄埔海关	天津海关	—	—

2.2 识别策略与数据描述

对于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而言,我们能够观察该海关关长调任其他海关关长后该海关企业的出口情况,无法同时观察该没有发生关长交流企业的出口情况;同理,如果没有关长交流的海关,也无法同时观察其发生关长交流时企业的出口情况。基于此,本文采用倍差法分析某一个海关发生关长交流后,该海关的企业出口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处理组为2007—2013年间发生过关长交流的海关,控制组为2007—2013年间未发生过关长交流的海关,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 ex_{itf} = \alpha + \beta \text{customs}_{it} + \mu_i + \sigma_t + \delta_f + \varepsilon_{itf} \quad (1)$$

其中, i 和 t 分别表示直属海关和年份, f 表示企业; ex 是企业出口额, $\ln ex$ 是企业出口额的对数; μ_i 表示地区(海关)固定效应, σ_t 表示时间固定效应, δ_f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 customs_{it}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关长交流前后与关长是否交流的交乘项。若出口企业所属海关 i 在时间 t 发生关长交流,则 customs_{it} 赋值为1,否则为0,它可以衡量企业是否受到关长交流的冲击。方程中的 β 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参数,它表示相对于没有发生过关长交流的海关,以发生过关长交流的海关为通关关口的出口企业所额外发生的变化。更具体的来说,可以根据海关 i 在某时刻是否发生关长交流划分处理组和控制组,前者是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14个),后者为未发生过关长交流的海关(28个),进而通过比较两组发生变化的不同来估计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效果。

本文研究对象为2007—2013年间42个直属海关的关长,企业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数据库。首先,由于HS6分位编码在2007年和2012年均进行了调整,我们将出口数据汇总至HS6分位层面并统一调整为HS2007编码形式。其次,剔除贸易中间商的样本,即剔除企业名称中含有“进口”“出口”“进出口”

^① 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中有11个海关的关长调任至出口更多的海关:福州海关、贵阳海关、哈尔滨海关、昆明海关、满洲里海关、南昌海关、青岛海关、深圳海关、沈阳海关、太原海关、天津海关。

“贸易”“外经”及“外贸”等字样的企业。需要注意的是,中国海关数据库中的对企业通关关口细化至中国海关组织机构中的第三层,即直属海关下辖 562 个隶属海关机构。由于本文关长交流数据为各直属海关关长的交流信息数据,因此,需要将企业通关关口对应至各直属海关。除此之外,政府官员开始在某地任职的时间通常不是某年的开始月份或者结束月份,而是年中某一月份开始。本文主要研究关长交流后对流出海关企业出口的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关长离任时间的确定。本文借鉴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的工作确认关长交流年份,对于 1—5 月份离任的关长,则该年为关长交流年份,即政策开始时间;同理,6—12 月份离任的关长,则下一年为关长交流年份。

表 2 汇报了 HS 6 分位企业出口的描述性统计。2007—2013 年间,平均而言,处理组的企业出口为 9.576,控制组为 9.495,前者比后者显著高了 0.081,且通过显著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这表明,与 28 个未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相比,平均而言,以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为通关关口的出口企业,其出口额显著提高。此外,处理组对应出口企业的出口目的地数量显著提高 8 个百分点。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处理组				控制组				均值之差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出口额	9.576	2.723	0.000	24.381	9.495	2.780	0.000	23.466	0.081***
出口产品种类	3.945	1.845	0.000	8.141	3.857	1.778	0.000	8.123	0.088
出口产品价格	3.881	2.388	-6.924	18.561	4.038	2.601	-9.219	18.802	-0.157
出口目的国数量	2.762	1.444	0.000	5.278	2.682	1.437	0.000	5.171	0.080***
出口关系数量	4.708	1.998	0.000	10.636	4.646	1.962	0.000	10.433	0.062

注:1. 本表为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的描述性统计。2. 数据来源:2007—2013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由于西藏地区的特殊性,本文删除企业注册地为西藏的样本。3. 均值之差:该列为处理组与对照组各变量的均值之差;***、**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 1%、5%和 10%的统计检验。下文同。

3 基本回归结果

3.1 对流出地的影响

首先,本文利用 2007—2013 年间的海关出口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关长交流对其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由表 3 中的基准回归结果可知,在 2007—

2013年间,关长交流显著提高了流出地的企业出口。具体而言,表3第(1)列汇报了以式(1)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关长交流(customs)的回归系数为0.069,能够通过显著性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对照组相比,平均而言,以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为通关关口的企业出口额显著提高6.9个百分点。这个结果意味着关长异地交流对原海关的企业出口有显著促进作用,即关长交流促进了流出地的企业出口。

表3 基本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全样本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海关层面
customs	0.069 *** (8.396)	0.071 *** (6.546)	0.069 *** (8.186)	0.184 * (1.736)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No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 ²	0.270	0.296	0.274	0.974
观察值	15382133	4109412	11191031	270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关长交流对不同贸易形式的影响。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模式分别属于产品内贸易模式和传统贸易模式,这两类贸易模式在国际贸易分工中存在重大差异,所以关长交流对不同贸易模式的出口企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本文按照企业的出口模式将样本划分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并对模型(1)进行分样本检验。如表3第(2)列和第(3)列所示,关长交流虚拟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比较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回归系数知,关长交流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要高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又可细分为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贸易合同中的甲方提供代加工产品或设备,乙方不负责销售仅收取加工费;进料加工是指由乙方从外购进原材料,加工后销往国外。无论是进料加工还是来料加工,都涉及进口原料和出口产品两个过程,相较于一般贸易,出口企业需要更多贸易资源和信息。因此,加工贸易更易受到关长交流的影响。

官员是行政管理中重要的干部资本,官员异地交流是干部治理制度在不同的地区和部门间重新配置干部资本的过程,这一过程建立并强化了不同地区和部门之间的政治联系,从而对地区整体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王贤彬和黄亮雄,2020)。海关关长是负责其领域内的宏观贸易业务,关长异地交流可能改变地区的出口表现。鉴于此,本文在原文基础检验的基础上,加入关长异地交流对流出地整体出口的影响检验。由于,中国并不是“一省一直属海关”或者“一市

一直属海关”的制度,可能会有一省有多个直属海关,而有些市却没有直属海关。本文的重要解释变量为直属海关关长的异地交流数据,因此,本文主要研究各关长异地交流对各直属海关整体出口的影响,即将数据合并至海关-年份层面进行回归。如表 3 第(4)列所示,关长交流(customs)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关长异地交流会显著促进流出地海关的出口额,关长异地交流会影响地区的出口表现。

根据徐现祥和王贤彬(2010)的研究可知,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官员自身能力是中央党政部门任命地方各级官员时重要的考察指标。因此,关长的能力可能会对关长的交流作用产生影响。本文依据关长年龄和受教育程度构建官员能力指标,系统研究官员能力对关长交流作用的影响。我们用关长的最高学历衡量其受教育程度,分别按照大专及以下、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设置 0~3 的虚拟变量。官员年龄越大,工作经验越丰富,越“德高望重”,更易促进政策实施和提升经济绩效(王贤彬和徐现祥,2014)。受教育程度越高以及专业任职经历越丰富的领导人,能够更好地推进经济改革,取得更好的经济改革绩效(Dreher et al., 2009)和促进经济增长(Besley et al., 2011)。因此,预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关长交流的作用有正向影响。表 4 第(1)列和第(2)列分别考察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关长交流作用的影响。由回归结果知,关长年龄和受教育程度对关长交流的作用有显著负向影响,与预期并不一致。这可能是因为关长能力越强,在工作上也更容易获得下属和领导的支持,更易在工作中取得成绩,他们追求“政绩”表现的动机更大(王永进和黄青,2018)。当调任到其他海关后,他们更倾向于尽快在新岗位做出“成绩”,而忽略与原工作岗位企业的沟通,关长交流的作用受到限制。

表 4 关长能力及任期与关长交流

被解释变量	(1)	(2)	(3)
	流出地企业出口额		
customs	0.978 *** (9.557)	0.082 *** (9.591)	0.110 *** (10.772)
customs×age	-0.018 *** (-8.841)		
customs×edu		-0.033 *** (-6.024)	
customs×rq			-0.019 *** (-5.12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续表

被解释变量	(1)	(2)	(3)
	流出地企业出口额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R^2	0.270	0.270	0.270
观察值	15382133	15382133	15352843

任期作为中央治理地方官员的重要手段,任期过短可能会导致官员目光短浅,急功近利;任期过长,官员缺少晋升激励,工作积极性降低,为腐败提供温床(王贤彬和徐现祥,2008)。因此,关长任期可能会影响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的出口效应。随着关长在新海关任职时间的延长,会积累更多有利于企业出口的信息,可能对关长交流的作用产生正向影响。引入关长在任年数,表示关长交流到新海关年份至观察期年底的年数。估计结果如表4第(3)列所示,关长任期对关长交流与流出地企业出口之间的关系存在负向影响,与预期结果并不一致。主要是因为,基于样本分析知,关长的平均任期为4~5年,关长调动过于频繁,任期普遍偏短,并不能充分发挥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的出口效应。较短的任期会造成关长行为的短期化,在其职业生涯的后半期为了能够获得更大的晋升机会,其会更加注重对在任海关的关注,而忽视与原海关企业的沟通和交流,这也更加有利于提升其在任期间的工作绩效。

3.2 动态效应检验

前文研究有助于分析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平均影响,但不能反映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动态效应。本文接下来检验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动态效应。为此,本文借鉴 Jacobson et al. (1993) 的研究,在标准回归中加入了一系列虚拟变量,以追踪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逐年的影响:

$$\ln ex_{it} = \alpha + \beta_1 customs_{it}^{-3} + \beta_2 customs_{it}^{-2} + \cdots + \beta_7 customs_{it}^{+3} + \mu_i + \sigma_t + \delta_f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关长交流的虚拟变量 $customs_{it}^j$ 在关长交流前的第 j 年或关长交流后的第 j 年取 1, 否则取 0。 $customs_{it}^{-3}$ 在关长交流前三年或三年以上取 1, $customs_{it}^{+3}$ 在关长交流后三年或三年以上取 1。因为,这些端点年份的数据方差更大,估计的准确度较低。图 1 显示了在 95% 的置信区间下 β 的估计值。

由图 1 可知,关长交流的作用很快显现出来。关长交流虚拟变量的系数在关长交流前的所有年份均不显著,表明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关长交流前不存在明显差异,即满足倍差法估计的平行趋势假设。在关长交流当期,关长交流虚拟变量的系数显著上升, $customs_{it}^0$ 为正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因此,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迅速发挥作用。关长交流的作用在交流后两年内都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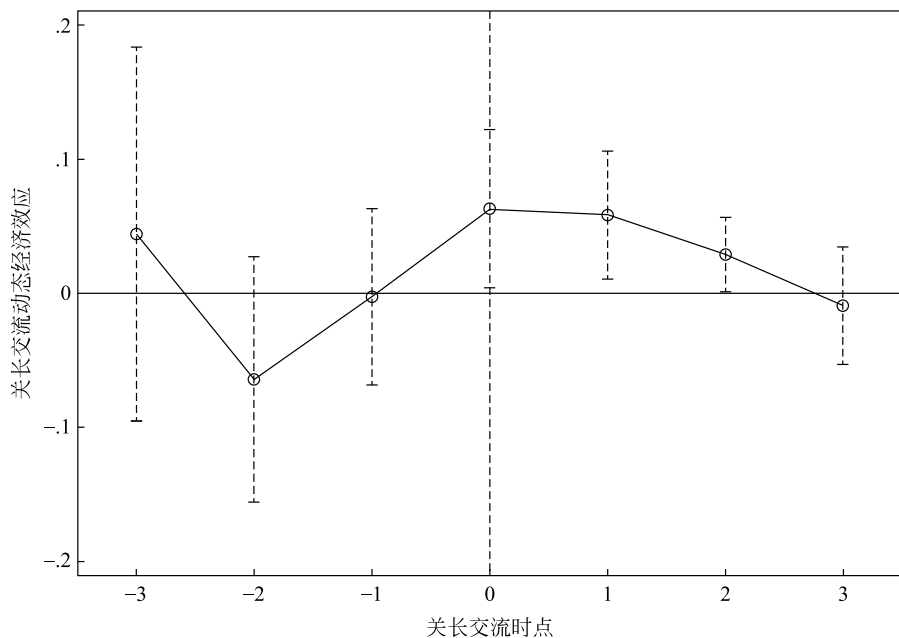


图1 倍差法动态效应图

为正,但影响系数有逐年下降的趋势,在关长交流后第三年,影响系数为负不显著。与前文回归结果一致,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随着关长交流年份的延长,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逐年缩小直至消失。直属海关关长的平均任期为4~5年,随着关长交流时间的延长,在其任期的中后期,关长在现任海关逐渐建立新的“工作圈”,其会更注重与新关口的出口企业之间的联系,从而将更多的资源和信息分配给现海关的出口企业,忽视与原海关出口企业的交流,因为这更有利于提高他在新岗位的“政绩”。

4 影响渠道研究

4.1 流入地出口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数据分析可知,14位交流到其他海关的关长中有11位交流到出口相对更多的地区。出口更多的地区也意味着该地区的开放程度更高,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联系更为密切。关长调任到此类地区后通过参与地区贸易发展,掌握更多国际经济活动的信息,是否会对流出地企业出口产生更为明显的促进效应?为回答该问题,本文展开以下研究:引入变量 y_n ,若关长流入地海关所在地区比流出地海关所在地区出口更多,则 y_n 取1,否则取0。回归结果如表5所

示。由表 5 第(1)列可知,关长交流的流入地出口更多会对关长交流的作用产生正向影响。改变处理组重新检验上述结论。本文将设置两个不同的处理组:一组是流入地出口更多的地区——11 个海关,另一组是流入地出口更少的地区——3 个海关。当关长交流主要通过流入到出口更多的地区发挥作用时,11 个流入地出口更多的海关的企业出口与对照组的差距将大于流入地出口更少海关的企业出口与对照组的差距。结果如表 5 第(2)列和第(3)列所示。流入地出口更多的海关,关长交流虚拟变量的系数为 0.077,通过显著性水平为 1% 的统计检验。但流入地出口更少的海关,关长交流系数为 0.024,且不再显著。这一系数与第(2)列中的结果相比明显下降,印证了关长交流主要通过交流到出口更多的地区发挥作用。出口更多的地区一般开放程度较高,如表 1 所示,关长流入地如深圳海关、广州海关、杭州海关、宁波海关等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在全国出口贸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具备更好的贸易条件。这些先开放的地区汇聚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具备丰富经验和能力的国际贸易人才,进而促进地区贸易发展,增进地区与国际经济活动的联系,掌握全球最新贸易资源和贸易信息。此外,规模经济导致地区集聚效应。以长三角地区为例,上海作为国际航运中心的地位无可取代,浙江则拥有全国最长的海岸线,处于连接国际航线和国内支线的良好位置。这些先开放的地区作为全国国际贸易活动最为活跃的地区,国际贸易信息交流更为频繁,资源共享更为便捷。关长交流到此类地区,通过促进该地区国际贸易发展,掌握更多实时国际贸易信息和资源,对关长促进流出地企业出口有积极作用。

表 5 流入地出口与关长交流

被解释变量	(1)	(2)	(3)
	流出地企业出口额		
customs	0.025 (1.568)	0.077 *** (8.706)	0.024 (1.450)
customs×y _n	0.053 *** (3.034)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R ²	0.270	0.269	0.257
观察值	15352843	14724443	11945480
处理组	14 个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	流入地出口更多的 11 个海关	流入地出口更少的 3 个海关
对照组		28 个未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	

4.2 影响渠道

如前文所述,关长交流后仍然关注原海关的企业出口,关长交流主要通过交流到出口更多的地区发挥作用。那么关长交流主要通过什么渠道影响企业出口结构呢?本小节重点考察关长交流通过什么渠道影响流出地企业而出口。本文借鉴王永进和黄青(2018)的研究,主要考察以下四个方面。出口产品种类(variety):年份-企业-HS 6 分位层面,HS 8 分位产品种类数的对数;出口产品平均价格(price):年份-企业-HS 6 分位层面,所有 HS 8 分位产品平均价格的对数;出口关系数量(number):年份-企业-HS 6 分位层面,企业一条出口记录对应一个出口关系,即年份-企业-HS 6 分位层面企业所有出口关系数的对数;出口目的国数量(origin):年份-企业-HS 6 分位层面,企业出口目的国数目的对数。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关长交流对出口产品平均价格、出口产品种类和出口关系数量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但是并不显著。仅在出口目的国数量中,关长交流虚拟系数为 0.030,且通过显著性为 1%的统计检验。这说明,尽管关长交流到出口更多的地区可以获得更多实时国际贸易信息,但也仅能通过帮助企业解决新市场的进入问题,进而扩大企业的国际贸易的区域范围,而对企业进入新市场的发展问题帮助甚微。出口企业可供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产品价格的提升以及产品关系的增长,往往需要耗费企业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而由前文研究发现关长交流的作用最多能持续两年,并不能为出口企业提供长期帮助,这可能是为什么关长交流对出口产品价格、产品种类及产品关系无显著影响的原因。

表 6 影响渠道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variety	price	number	origin
customs	0.009 (1.509)	0.002 (0.145)	0.008 (0.901)	0.030 *** (4.667)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 ²	0.959	0.876	0.939	0.950
观察值	15382136	15377812	15382136	15382136

5 稳健性检验

5.1 安慰剂检验

若存在某些因素既有利于从企业出口,又能增加关长交流的可能性,那么,

本文的回归结果只能反映这些因素联合作用的结果,而不单纯反映关长交流的贸易促进作用。为避免这些特殊且不易被观察的因素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安慰剂,排除这些可能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李书娟等(2016)的研究,在不改变交流海关的情况下,通过前置关长交流时间,采用同样的方法对关长交流的效应存在与否进行检验。海关关长平均任期为 4~5 年,因此,本文将关长交流时间分别前置 2~4 年,构建关长提前交流的安慰剂检验。若不存在这些可能因素,则前置关长交流时间后,关长交流对企业出口的促进效应不再存在。为了与表 6 的回归结果可比,对照组保持不变。

表 7 汇报了前置交流时间的安慰剂检验结果。与预期一致,人为前置关长交流时间后,关长交流的贸易促进效应不再存在。如表 7 第(1)至第(3)列所示,前置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证明不存在特殊因素干扰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 7 安慰剂检验

被解释变量	(1)	(2)	(3)
	前置 2 年	前置 3 年	前置 4 年
before2	-0.156 (-1.255)		
before3		-0.199 (-1.470)	
before4			-0.266 (-1.49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R^2	0.020	0.020	0.020
观察值	15428418	15428418	15428418

5.2 控制新上任关长因素

对于关长流出地而言,关长交流是“新老交替”的过程。“老”关长调任其他海关,会有“新”关长上任。现有文献发现,通过交流而来的官员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有显著影响(Persson and Zhuravskaya,2016;王贤斌和徐现祥,2017)。为了排除新上任关长可能带来的影响,本节将对前文的主要结果在控制新上任关长交流变量后进行重现。引入新变量 customs_new,衡量新任关长异地交流情况。当新上任关长为异地交流而来时,customs_new 取 1;其他取 0。在 2007—2103 年间,共有 45 位新上任关长为异地交流而来。如果控制了新任关长的因素,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依然存在,说明新上任关长交流与“老”

关长交流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此外,省长(省委书记)作为干部交流中常见且引人关注的一类交流形式,其对流入地的经济增长有正的交流效应(徐现祥等, 2007),可能会对流入地的企业出口产生影响。鉴于此,需要控制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影响。引入变量 `governor_new`,衡量省长(省委书记)异地交流的情况。当某省区的省长或省委书记为异地交流而来时,`governor_new` 取 1;其他取 0。若控制了新上任关长和省长(省委书记)的异地交流因素,检验结果较前文无实质性变化,则证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表 8 的 Part A~Part D 汇报了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影响的重现结果,在控制了新上任关长和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因素后,本文的研究结果依然成立。表 8 的 Part A 报告了基本回归结果和区分贸易形式的结果重现。在控制新上任关长和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变量后,无论是全样本,还是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关长交流虚拟变量系数依然为正,且通过显著性为 1%的统计检验。关长交流对加工贸易的影响依旧比一般贸易大。关长异地交流依旧显著促进流出地海关的整体出口表现。表 8 的 Part B 报告了关长能力及关长任期对关长交流作用影响的结果重现。在控制新上任关长和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变量后,关长交流虚拟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正,关长交流分别与关长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关长任期的交互项也依然显著为负,且关键变量的大小与表 4 的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表 8 的 Part C 报告了关长交流流入地的出口情况对关长交流作用影响的结果重现。在控制了新上任关长交流和省长(省委书记)因素后,关键变量的大小和显著性与表 5 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说明关长主要通过交流到出口更多地区都流出地出口企业产生影响的研究结果是准确的。表 8 的 Part D 报告了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渠道的结果重现。在控制新上任关长因素后,关长交流对出口产品种类,出口关系和出口目的国的回归结果与表 6 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出口产品平均价格中,关长交流的系数在控制了新上任关长交流的因素后变为负数,但依旧不显著。这说明在控制了新上任关长和省长(省委书记)的因素后,关长交流对出口产品平均价格的影响依旧不显著,与前文回归结果基本一致。综上所述,加入新上任关长和省长(省委书记)交流变量后的回归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这充分说明,“老”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与新上任关长交流因素的影响是相互独立的。

表 8 控制新上任关长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Part A			
	(1)	(2)	(3)	(4)
	全样本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海关层面
customs	0.049 ***	0.050 ***	0.049 ***	0.175 *
	(5.453)	(5.414)	(4.072)	(1.653)

续表

Part A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全样本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海关层面
customs_new	0.037 *** (4.570)	0.036 *** (4.201)	0.039 *** (3.692)	0.0590 (0.574)
governor_new	0.034 *** (3.708)	0.035 *** (3.687)	0.030 ** (2.541)	-0.127 (-1.293)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 ²	0.270	0.296	0.274	0.974
观察值	15352843	4101178	11170149	270
Part B				
被解释变量	(1)	(2)	(3)	
	流出地企业出口额			
customs	0.885 *** (8.195)	0.062 *** (6.715)	0.089 *** (7.289)	
customs_new	0.018 ** (2.159)	0.038 *** (4.715)	0.026 *** (2.936)	
governor_new	0.021 ** (2.268)	0.032 *** (3.484)	0.030 *** (3.311)	
customs×age	-0.016 *** (-7.697)			
customs×edu		-0.033 *** (-5.909)		
customs×rq			-0.016 *** (-4.024)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R ²	0.270	0.270	0.270	
观察值	15352843	15352843	15352843	
Part C				
被解释变量	(1)	(2)	(3)	
	流出地企业出口额			
customs	0.008 (0.516)	0.055 *** (5.679)	0.014 (0.826)	
customs_new	0.036 *** (4.401)	0.038 *** (4.655)	0.021 ** (2.118)	

续表

Part C				
被解释变量	(1)	(2)	(3)	
	流出地企业出口额			
governor_new	0.034 *** (3.696)	0.042 *** (4.368)	0.031 *** (3.180)	
customs×y_n	0.050 *** (2.826)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R ²	0.270	0.269	0.257	
观察值	15352843	14695153	11916190	
处理组	14 个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	流入地出口更多的 11 个海关	流入地出口更少的 3 个海关	
对照组	28 个未发生关长交流的海关			
Part D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varity	price	number	origin
customs	0.017 (1.432)	-0.030 (-1.561)	0.013 (1.422)	0.032 *** (4.657)
customs_new	-0.019 *** (-3.100)	0.075 *** (4.666)	-0.00100 (-0.132)	-0.00500 (-0.755)
governor_new	-0.040 *** (-5.663)	-0.0150 (-0.838)	-0.031 *** (-3.406)	0.0110 (1.561)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 ²	0.960	0.877	0.950	0.940
观察值	15352846	15348553	15352846	15352846

6 流入地视角考察

王贤彬和徐现祥(2017)、Persson and Zhuravskaya(2016)的研究指出官员交流对流入地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本节在此基础上考察关长交流对流入地出口的影响。本节继续采用倍差法分析某一个海关发生关长交流后,该流入地海关的企业出口是否发生显著变化。处理组为 2007—2013 年间发生过关长异地流入的海关,控制组为 2007—2013 年间未发生过关长异地流入的海关,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ln ex_in_{it} = \gamma + \delta customs_in_{it} + \rho_i + \tau_t + \varphi_f + \varepsilon_{itf} \tag{3}$$

ex_in 是流入地企业出口额,lnex_in 是企业出口额的对数。customs_in 是本节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关长流入前后与关长是否交流的交乘项。若出口企业所属海关*i*在时间*t*发生关长流入,则 customs_in 赋值为 1,否则为 0,它可以衡量企业是否受到关长流入的冲击。其他系数含义同上文。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customs_in 的回归系数为 0.034,且显著。这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与对照组相比,平均而言,以发生关长流入的海关为通关关口的企业出口额显著提高 3.4 个百分点。这个结果意味着关长交流对流入地的企业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表 9 关长交流对流入地企业出口

被解释变量	(1) 全样本
customs_in	0.034 *** (9.949)
年份固定效应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R ²	0.281
观察值	13205319

接下来,本文进一步分析关长流入如何正向促进企业出口。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地理、风土人情等方面差异较大,关长在不同的地区任职都会积累重要的经验和知识。但中国各地方政府的治理水平和市场完善程度存在重大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关长能力和经验的差异性。知识、经验和能力更多地体现在官员的个人人力资本中,但手段和资源则为外部影响因素。如前文所述,关长交流后可以通过与原海关企业的联系影响原海关的企业出口。关长在原海关任职期间,关长与企业出口较多的国家或地区企业可能会建立较多的联系。那么,关长在交流到新海关之后,其所拥有的海外资源是否可以被新海关企业利用?因此,下文进一步确定关长流入地企业对流出地企业出口较多地区的出口是否存在差异。本文主要考察关长流入地企业出口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目的地前四名的出口情况。引入变量 exmost,衡量关长流出地企业出口目的地的虚拟变量。例如,流入地企业出口目的地是关长流入前任职海关企业出口最多的国家或地区,则取 1,否则取 0。以此类推。如表 10 所示,关长流入地企业对流出地企业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的回归系数为 0.043,且通过显著性为 1%的统计检验。但关长流入地企业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第二名和第三名的国家(地区)的出口不显著,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第四名的国家(地区)出口表现在出显著的负

向作用。因此,关长交流对流入地企业出口的正向作用主要通过影响流入地企业对流出地企业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的出口。

表 10 关长交流对流入地企业出口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first	second	third	forth
customs×exmost	0.043 *** (5.218)	-0.003 (-0.347)	0.011 (0.904)	-0.021 * (-1.934)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R ²	0.827	0.827	0.827	0.827
观察值	13205319	13205319	13205319	13205319

接下来本文考察流入地企业对流出地企业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的出口额的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探究流入地企业对流出地企业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出口的传导机制。首先,研究广度边际。单个厂商存在进入或者退出行业的行为,并且企业在各个年度的出口并不一定连续,本文从新增出口产品种类数目的变化来看广度边际对关长流入的反应。表 11 第(1)列将被解释变量转变为广度边际,即“流入地企业对流出地企业出口最多的国家(地区)新增出口产品种类数目”,发现处理组和控制组新增产品种类相差无几,发生关长流入的海关,出口企业主要增加对现有出口产品的出口量,而不是通过新增产出口品种类增加企业出口量。就目前而言,拓展新的出口产品种类成本高昂,企业并不愿意放弃原有的出口产品,出口企业继续增加现有产品的出口更加有利可图。表 11 第(2)列采用企业-国家-产品-年份样本,对深度边际展开分析。本文仅保留在发生关长流入前已经进入流出地出口最多国家(地区)的产品数据,将单个产品出口额作为被解释变量。结果发现,对现有产品出口额在发生关长流入后显著增长,表明深度边际是关长交流促进流入地企业出口的主要贡献者。

表 11 广度边际与深度边际

被解释变量	(1)	(2)
	广度边际	深度边际
customs×exmost	0.002 (0.421)	0.051 *** (5.411)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企业固定效应	Yes	Yes
地区固定效应	Yes	Yes
R ²	0.752	0.448
观察值	3291959	23164589

7 结论性评述

本文通过收集中国各直属海关关长交流数据,匹配2007—2013年中国海关出口数据,利用倍差法,考察关长交流对其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长交流对关长流出地的企业出口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关长交流对不同贸易形式的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2)关长能力越强,他们承受的晋升激励越大,会更加注重于所在岗位的“政绩”表现,反而不利于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发挥作用;(3)关长任期会负向影响关长交流的作用,动态效应检验的结果也表明,随着关长在新海关任职年数的延长,关长交流的作用会逐年缩小,且在关长交流后第三年失去作用;(4)通过设置不同的处理组研究发现,关长主要通过交流到出口更多的地区对流出地的企业出口产生影响,交流到出口更少地区的关长对流出地的企业出口并没有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5)关长交流主要是通过扩大企业出口目的地的范围来影响企业出口。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控制了新上任关长的因素后依然成立。

本文主要扩展了有关地方官员的研究文献。一方面,本文是对官员交流与经济发展相关文献的补充。现有官员交流的文献主要关注行政官员,如省长和市长交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少关注如海关关长这种专业性官员的交流政策。同时,现有文献多从官员更替对经济增长、财政支出和企业信贷等进行研究,而鲜有关注官员更替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在研究官员更替与经济发展时,更多是从官员流入地的角度出发,忽视了官员交流对流出地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文研究海关关长交流对关长流出地企业出口的影响,既关注专业性官员交流的作用,又考察了关长交流对流出地企业出口结构的影响,是对现有官员交流研究文献的补充。同时,本文还综合考虑关长交流的异质性影响,强调关长能力、贸易形式和关长流入地出口规模的异质性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企业出口的确可以对官员的配置进行反应。官员配置是政治人力资本的再配置,伴随官员经验和信息的跨区域流动,但经验和信息的跨区域流动效率又因各种外部条件的影响而存在差异(王贤彬和徐现祥,2017)。2006年《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正式颁布之后,中国的官员跨区域交流愈发普遍,根据本文的研究发现,官员调任后的职位和流入地经济发展情况也会对官员流出地的经济发展产生显著影响。特别是官员流入地是经济更加发达的地区对流出地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更甚。本文对此提供了更加严谨的实证支持,为人们对于官员配置机制的理解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 陈刚, 李树. 2012. 官员交流、任期与反腐败[J]. 世界经济, 35(2): 120-142.
- Chen G, Li S. 2012. Official exchange, tenure and anti-corruption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35(2): 120-142. (in Chinese)
- 陈绍俭, 冯宗宪, 殷永昆. 2019. 官员来源、本地信息与地区经济增长——基于地级市数据的新证据[J]. 南方经济, (1): 120-136.
- Chen S J, Feng Z X, Yin Y K. 2019. Leader sources, local inform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New evidence from city-level data [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1): 120-136. (in Chinese)
- 戴美虹, 刘海洋, 林令涛. 2021. 制度还是技术影响中国的出口活力: 以国有企业为例[J]. 世界经济, 44(3): 110-134.
- Dai M H, Liu H Y, Lin L T. 2021. Institution or technology? The driving force of vitality of China's export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44(3): 110-134. (in Chinese)
- 董志强, 周敏丹, 魏下海. 2012. 地市级官员交流与地方经济发展——基于广东省(1988—2009)的经验研究[J]. 南方经济, (10): 32-42.
- Dong Z Q, Zhou M D, Wei X H. 2012. Prefectural-level official exchanges and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Guangdong (1988—2009) [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10): 32-42. (in Chinese)
- 范子英, 李欣. 2014. 部长的政治关联效应与财政转移支付分配[J]. 经济研究, 49(6): 129-141.
- Fan Z Y, Li X. 2014. Political connection of ministers and the allocation of fiscal transfer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9(6): 129-141. (in Chinese)
- 范子英, 彭飞, 刘冲. 2016. 政治关联与经济增长——基于卫星灯光数据的研究[J]. 经济研究, 51(1): 114-126.
- Fan Z Y, Peng F, Liu C. 2016.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DMSP/OLS satellite data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1(1): 114-126. (in Chinese)
- 黄玖立, 李坤望. 2013. 吃喝、腐败与企业订单[J]. 经济研究, 48(6): 71-84.
- Huang J L, Li K W. 2013. Eat-drink, corruption and firm's purchase order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8(6): 71-84. (in Chinese)
- 黄顺武, 刘海洋, 李婷. 2017. 地方政府官员能否提振本地企业出口——来自中国地级市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证据[J]. 国际贸易问题, (8): 40-50.
- Huang S W, Liu H Y, Li T. 2017. Politicians and firm export—Evidence from China's prefectural official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8): 40-50. (in

Chinese)

李江涛, 严文龙, 曾铁兵. 2015. 政治关联、制度环境与会计师事务所经营业绩[J]. 审计与经济研究, 30(5): 32-43.

Li J T, Yan W L, Zeng T B. 2015. Political associatio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accounting firm operating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Audit & Economics*, 30(5): 32-43. (in Chinese)

李书娟, 徐现祥, 戴天仕. 2016. 身份认同与夜间灯光亮度[J]. 世界经济, 39(8): 169-192.

Li S J, Xu X X, Dai T S. 2016. Identity and luminosity[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39(8): 169-192. (in Chinese)

李书娟, 徐现祥. 2016. 身份认同与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15(3): 941-962.

Li S J, Xu X X. 2016. Identity and growth[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5(3): 941-962. (in Chinese)

梁平汉, 高楠. 2014. 人事变更、法制环境和地方环境污染[J]. 管理世界, (6): 65-78.

Liang P H, Gao N. 2014. Personnel change, legal environment and local environmental pollution[J]. *Management World*, (6): 65-78. (in Chinese)

梁漱溟. 1949.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Liang S M. 1949. *Essen of Chinese culture* [M].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ese)

林毅夫, 蔡昉, 李周. 1999. 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迹”的再解释[J]. 中国社会科学, (5): 4-20.

Lin Y F, Cai F, Li Z. 1999.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5): 4-20. (in Chinese)

刘斌, 王杰. 2016. 地方官员腐败与企业出口模式——基于中国事实的经验研究[J]. 经济学报, 3(4): 62-84.

Liu B, Wang J. 2016. Corruption of local officials and enterprise export mode—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Chinese facts[J].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3(4): 62-84. (in Chinese)

刘玉海, 赵鹏. 2018. 地方官员治理与城市绿色增长[J]. 经济学报, 5(4): 45-78.

Liu Y H, Zhao P. 2018. The impact of local official governance on urban green growth[J].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5(4): 45-78. (in Chinese)

吕朝凤, 陈霄. 2015. 地方官员会影响 FDI 的区位选择吗——基于倍差法的实证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 (5): 115-123.

Lyu C F, Chen X. 2015. Local officials and regional FDI: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difference-in-difference estim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5):

- 115-123. (in Chinese)
- 盛丹, 王永进. 2010. 地方政府周期性财政收支、融资依赖与地区出口结构[J]. 金融研究, (11): 1-18.
- Sheng D, Wang Y J. 2010. Local governments' cyclical fiscal expenditure and revenue, financial dependence and regional export structure [J].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11): 1-18. (in Chinese)
- 王贤彬, 徐现祥. 2008. 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的证据[J]. 管理世界, (3): 16-26.
- Wang X B, Xu X X. 2008. Source, destination, tenure and economic growth of local officials: Evidence from the governor and Secretary of the provincial Party committee of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3): 16-26. (in Chinese)
- 王贤彬, 徐现祥. 2014. 官员能力与经济发展——来自省级官员个体效应的证据[J]. 南方经济, (6): 1-24.
- Wang X B, Xu X X. 2014. Local leader competence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J].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6): 1-24. (in Chinese)
- 王贤彬, 徐现祥. 2017. 官员交流驱动外商投资[J]. 中国经济问题, (3): 88-100.
- Wang X B, Xu X X. 2017. Official rota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 [J]. *China Economic Studies*, (3): 88-100. (in Chinese)
- 王贤彬, 黄亮雄. 2020. 官员交流与经济发展——中国情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产业经济评论, (6): 70-85.
- Wang X B, Huang L X. 2020. Official ro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and outlook on economic studies in China[J]. *Review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6): 70-85. (in Chinese)
- 王永进, 黄青. 2018. 司法效率、契约密集度与出口绩效: 来自高院院长异地交流的证据[J]. 经济学报, 5(4): 177-207.
- Wang Y J, Huang Q. 2018. Judicial efficiency, contract intensity and export performance: A quasi-experiment from China's geographical rotation of judges[J].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5(4): 177-207. (in Chinese)
- 吴文锋, 吴冲锋, 芮萌. 2009. 中国上市公司高管的政府背景与税收优惠[J]. 管理世界, (3): 134-142.
- Wu W F, Wu C F, Rui M. 2009. Between the special connections that high-ranking managers of some of China's listed companies have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tax preference afforded to them [J]. *Management World*, (3): 134-142. (in Chinese)
- 徐现祥, 王贤彬, 舒元. 2007. 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交流的证据[J]. 经济研究, 42(9): 18-31.
- Xu X X, Wang X B, Shu Y. 2007. Local officials and economic growth [J].

-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2(9): 18-31. (in Chinese)
- 徐现祥, 王贤彬. 2010.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省级官员的证据[J]. 世界经济, 33(2): 15-36.
- Xu X X, Wang X B. 2010. Political incentive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a[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33(2): 15-36. (in Chinese)
- 徐现祥, 李书娟. 2019. 官员偏爱籍贯地的机制研究——基于资源转移的视角[J]. 经济研究, 54(7): 111-126.
- Xu X X, Li S J. 2019. A study of the mechanism of leaders' regional favoritism—Based on the resource reallocation perspective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4(7): 111-126. (in Chinese)
- 杨海生, 罗党论, 陈少凌. 2010. 资源禀赋、官员交流与经济增长[J]. 管理世界, (5): 17-26.
- Yang H S, Luo D L, Chen S L. 2010. The resources endowment, the interchange of officials' positions, and the economic growth[J]. *Management World*, (5): 17-26. (in Chinese)
- 杨其静, 郑楠. 2013. 地方领导晋升竞争是标尺赛、锦标赛还是资格赛[J]. 世界经济, 36(12): 130-156.
- Yang Q J, Zheng N. 2013. Is the competition for promotion of local leaders a scale competition, championship or qualification competition [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36(12): 130-156. (in Chinese)
- 杨瑞龙, 王元, 聂辉华. 2013. “准官员”的晋升机制: 来自中国央企的证据[J]. 管理世界, (3): 23-33.
- Yang R L, Wang Y, Nie H H. 2013.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of “quasi-officers”: Evidence from China's central enterprises[J]. *Management World*, (3): 23-33. (in Chinese)
- 姚洋, 张牧扬. 2013. 官员绩效与晋升锦标赛——来自城市数据的证据[J]. 经济研究, 48(1): 137-150.
- Yao Y, Zhang M Y. 2013. Performance of officials and the promotion tournament—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48(1): 137-150. (in Chinese)
- 张杰, 刘志彪, 张少军. 2008. 制度扭曲与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J]. 世界经济, (10): 3-11.
- Zhang J, Liu Z B, Zhang S J. 2008. Institutional distortion and export expansion of Chinese local enterprises[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10): 3-11. (in Chinese)
- 张军, 高远. 2007. 官员任期、异地交流与经济增长——来自省级经验的证据[J]. 经济研究, (11): 91-103.

- Zhang J, Gao Y. 2007. Term limits and rotation of Chinese governors: Do they matter to economic growth? [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1): 91-103. (in Chinese)
- 张平, 赵国昌, 罗知. 2012. 中央官员来源与地方经济增长[J]. *经济学(季刊)*, 11(2): 613-634.
- Zhang P, Zhao G C, Luo Z. 2012. Sources of central officials and local economic growth[J].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11(2): 613-634. (in Chinese)
- 周黎安. 2004. 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 *经济研究*, 39(6): 33-40.
- Zhou L A. 2004. The incentive and cooperation of government officials in the political tournament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rolonged local protectionism and duplicative investments in China[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39(6): 33-40. (in Chinese)
- Alesina A, Özler S, Roubini N, et al. 1996.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2): 189-211.
- Baldwin R. 2005.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trade: Testable and untestable properties of the Melitz model[R]. NBER Working Papers 5663.
- Besley T, Montalvo J G, Reynal-Querol M. 2011. Do educated leaders matter?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21(554): F205-F227.
- Boubakri N, Cosset J C, Saffar W. 2008. Political connections of newly privatized firms [J].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14(5): 654-673.
- Cao C F, Dong Y Z, Hou W X, et al. 2019. Provincial official turnover and bank loans [J]. *Pacific-Basin Finance Journal*, 57: 101202.
- Çolak G, Durnev A, Qian Y M. 2017.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IPO activity: Evidence from U. S.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52(6): 2523-2564.
- Deng Y P, Wu Y R, Xu H L. 2019. Political turnover and firm pollution discharges: An empirical stud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58: 101363.
- Dreher A, Lamla M J, Lein S M, et al. 2009.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leaders' profession and education on reform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7(1): 169-193.
- Earle J S, Gehlbach S. 2015. The productivity consequences of political turnover: Firm-level evidence from 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9(3): 708-723.
- Fisman R. 2001.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4): 1095-1102.
- Gao P J, Murphy D, Qi Y X. (2019-02-09).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public financing costs: Evidence from U. S. gubernatorial elections and municipal bond markets[EB/

- OL]. <https://ssrn.com/abstract=1992200>.
- Hassan M. 2017. The strategic shuffle: Ethnic geography, the internal security apparatus, and elections in Kenya[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2): 382-395.
- Hodler R, Raschky P A. 2014. Regional favoritism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9(2): 995-1033.
- Jacobson L S, LaLonde R J, Sullivan D G. 1993. Earnings losses of displaced workers [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3(4): 685-709.
- Jens C E. 2017.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investment: Causal evidence from U. S. gubernatorial elections[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4(3): 563-579.
- Jiang J Y, Mei Y. 2020. Mandarins make markets: Leadership rotations and inter-provincial trade in China[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47: 102524.
- Jones B F, Olken B A. 2005. Do leaders matter? National leadership and growth since World War II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3): 835-864.
- Julio B, Yook Y. 2012. Political uncertainty and corporate investment cycles[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7(1): 45-83.
- Krugman P R.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5): 950-959.
- Levchenko A A. 2007. Institutional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4(3): 791-819.
- Li H B, Zhou L A. 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 1743-1762.
- Luo W J, Zhang X M. 2022. Political turnover and corporat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China[J].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9(7): 573-578.
- Melitz M J.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71(6): 1695-1725.
- Olney W W. 2016.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firm-level export decisions[J]. *Economic Inquiry*, 54(2): 1105-1127.
- Persson P, Zhuravskaya E. 2016. The limits of career concerns in federalism: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4(2): 338-374.
- Rochlitz M, Kulpina V, Remington T, et al. 2015. Performance incentives and economic growth: Regional officials in Russia and China [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56(4): 421-445.
- Song M. 2014. Crony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C]. 2014 Meeting Papers 1145, Society for Economic Dynamics.
- Vahlne J E, Johanson J. 2017. From internationalization to evolution: The Uppsala

- model at 40 years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48 (9): 1087-1102.
- Zhao D X. 2015. *The confucian-legalist state: A new theory of Chinese hist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ong W G, Lin Y, Gao D X, et al. 2019. Does politician turnover affect foreign subsidiary performance? Evidence in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50(7): 1184-1212.

Customs Commissioner Rotation and Export of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stoms Commissioners' Outflow Places

Yongjin Wang Xiaojuan Yan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Abstract Official ration is an offici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ing the level of official governance, and it has become a noticeable phenomenon.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natural experiment of the ration of customs commissioner from 2007 to 2013, using the method of difference-in-differenc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the ration of customs commissioner on the export of enterprises in the places where they are outflows. The influence will only play a role when the inflow of customs commissioner is a region with more exports. This influence will also vary depending on the export form of the enterprises, the ability and term of office of the customs commissioners. The role of customs commissioner ration will play a role immediately after the ration of customs commissioners, but with the extension of the year of rations between customs commissioner ration, this effect has declined year by year, and disappeared in the third year; the role of the rations with the customs commissioner only affects the export volume of enterprises by affecting the scope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y of the exporting enterprises.

JEL Classification F12, H11, O11